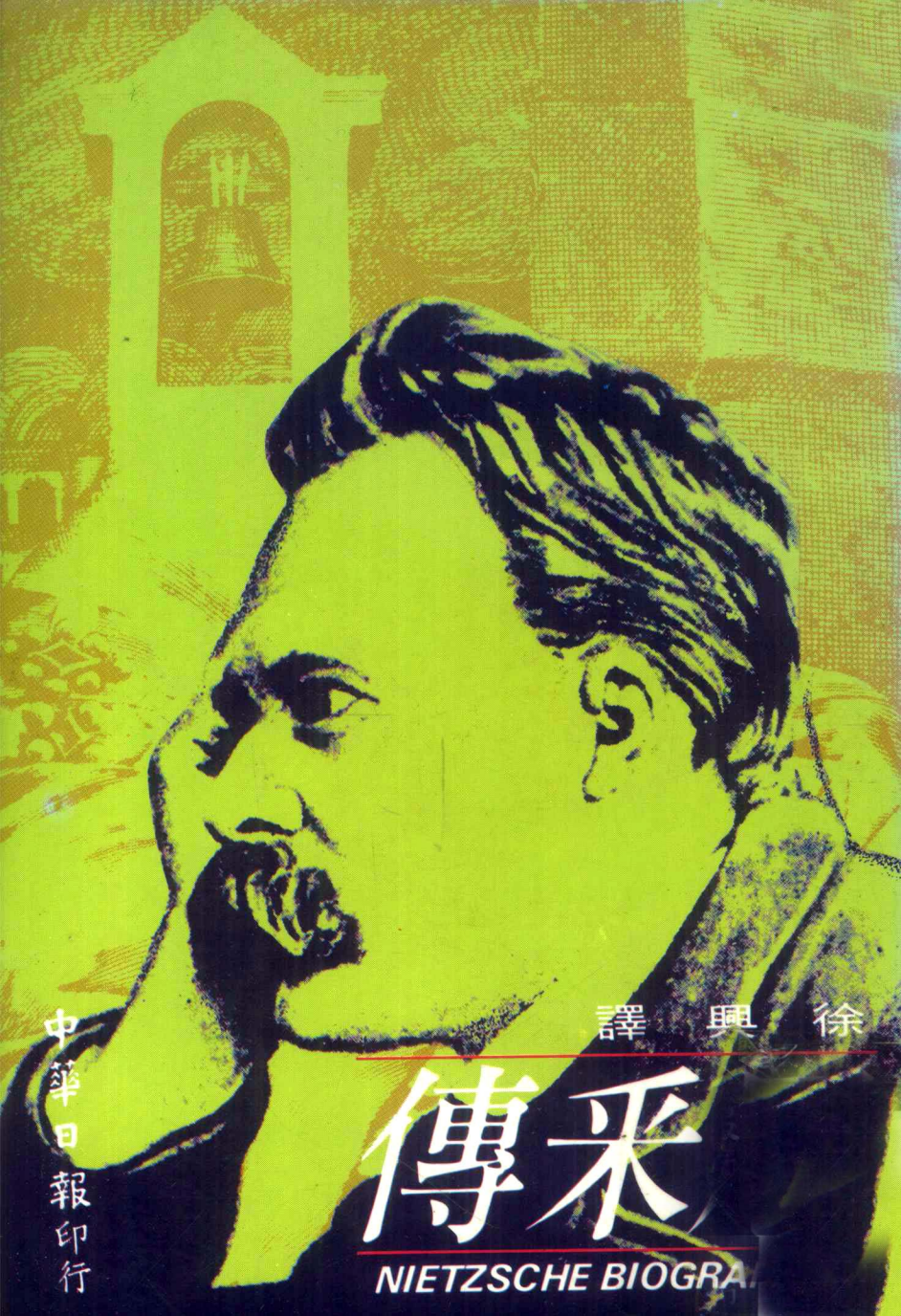




譯 興 徐

傳采

NIETZSCHE BIOGRA

中華日報印行

七十之書叢學文記傳報日華中

尼 采 傳

著原培思耶・爾卡

譯 興 徐



行印報日華中

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二六〇六號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月三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一日再版

中華日報傳記文學叢書之十七

尼采傳

定價：新臺幣九十元正

譯作人：徐

發行人：黃

肇

興珩

發行所：中華日報社出版部

地址：臺北市松江路一三一號

電話：五六三〇七八〇

郵撥：二二五〇

印刷所：三源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三元街五六巷一二號

電話：三〇一〇八八五

目錄

第一部 尼采的一生

第一章 傳略.....三

第二章 尼采的發展過程.....二三

第三章 朋友和寂寞.....四七

第四章 病.....八〇

第五章 結束.....九三

第二部 尼采的基本思想

第六章 人.....九七

第七章 真理.....一二九

第八章	歷史和現世紀·····	一六〇
第九章	世界的詮釋·····	一七三
第十章	界限和來源·····	一九七
第三部	尼采的思想方法	
第十一章	生命和知識·····	二一七
第十二章	如何去瞭解尼采·····	二二八

第一部
尼采的一生

第一章 傳略

生命的歷程：尼采生於洛肯(Röcken)的牧師公館。父母雙方的祖先中都有過牧師。當他五歲時，父親就過世了，母親便遷到諾姆堡(Naumburg)；尼采在那裡和他小兩歲的妹妹一起，在女性親戚羣中長大。到十歲時，他進入諾姆堡的文法學校(grammar school)就讀，到十四歲時(一八五八年)，他獲得普夫達中學(Shulpforta)一份包括食、宿和學費的獎學金(Freistelle)，那所莊嚴的寄宿學校，因其傑出優秀的人文教師而出名。到二十歲時(一八六四年)，他開始在波昂修習兩學期的大學課程，他加入那裡的弗蘭柯尼亞兄弟會(the Frankonia Fraternity)，於一八六五年，當他發現它在實際上不能與他所懷抱的理念吻合時，他才撤銷了會員資格。他和他的老師李歇爾(Ritschl)從波昂到了萊比錫；他和歐文·洛德(Erwin Rohde)在那裡成了這位語言學大師最傑出的門生。他在此地創立了語言學社(the philological society)，出版語言方面的研究報告。甚至在他修畢學分以前，在李歇爾的推荐下，便已獲得在

巴塞爾 (Basel) 的教授位置。李歇爾寫給巴塞爾當局的信上說：「三十幾年來，在我眼前力爭上游的青年俊彥不計其數，我沒有見過一個年輕人如尼采者，成熟得如此快，而又如此年輕……：。我敢預言，如果天假以年（願主賜他長壽！），他終將會成為德國語言學者中的頂尖人物。他目前祇有二十四歲：堅強，結實，健康，且身心都很健全……。他是萊比錫年輕語言學者中的偶像。你會說我描寫得有些令人不可思議。嗯，他事實上却是如此；同時，他也溫馴，謙遜……。他心志專一，他會達成所交付的任務的。」

尼采在精神崩潰以前，便開始了二十年的教學生涯，自一八六九至一八七九年，他是巴塞爾大學的一名教授，且如 J. 蒲克哈特 (J. Burckhardt) 一樣，也在教育學院 (The Pedagogical Institute) 擔任六小時教席。巴塞爾市的貴族家庭任他出入。他與大學的優秀學者們——如 J. 蒲克哈特、巴克封 (Bachfen)、休斯勒 (Heusler) 和祿底梅耶 (Rütimeyer) 建立了相當親密的關係。他和同住一棟房子的一位朋友歐弗貝克 (Overbeck) 之間，也建立了十分融洽的友誼。他與人們聯繫的巔峯——事實上是在他的一生中，而如此令人難忘的——是一八六九年和一八七二年間，在琉森 (Lucerne) 附近的屈布森 (Tribtschen) 時，與理查 (Richard) 和柯西馬·華格納 (Cosima Wagner) 間的頻繁來往。他於悲劇的誕生 (The Birth of Tragedy) 一書出版後，就被排擠出語言學界，而由范·維萊莫維茲 (Von Wiliamowitz) 接替了他的位

置。接着，巴塞爾的語言學者們都紛紛疏遠他。一八七三年，他開始得了那種胡言亂語症，以致迫使他於一八七六年至一八七七年間請假一年。那一年，他把大半時間與P·雷以（P. Rée）消磨在索倫托（Sorrento）的磨維達·范·梅森堡（Malrida von Meysenbug）的家中。一八七九年，三十五歲，他因病而被迫辭去了教職。

第二個十年期間（一八七九至一八八九年），尼采從一地旅行到另一地，是爲了要尋找一個能舒解他的痛楚的氣候，因爲季節的改變，他從來沒有在任何地方呆上幾個月。大部份時間，他逗留在恩加汀（Engadine）和里維拉海濱，偶而在威尼斯，最後則在杜林（Turin）。冬天最常消磨在尼斯，夏天則在西爾斯——馬力亞（Sils-Maria）。如流浪的使者一般，他在原野和簡陋的房間中過着樸素的生活，白天則在鄉間漫步，戴着一副綠色的遮陽板，以保護兩眼不受陽光照射，且與形形色色的遊客接觸。

當他早期的出版物——悲劇的誕生，和反駁史特勞斯不合時宜的沉思（Untimely Meditations）的第一部——引起了一陣轟動，受到了熱烈的讚賞或粗魯的指斥，而他的後期作品，卻可以說是成功的。警句集畢竟銷數寥落，而尼采也得了健忘症。特殊的環境，使他與出版商間陷入了僵局，他最後自費出版作品。祇有當他在清醒的最後幾個月中，他才體會到即將到來的令名之最初訊息；關於這一點，他沒有一刻疑惑過。

自失業後，他就專心致力於他真正所領會的使命感上，真可謂過着與世無涉的生活。當他的健康略有起色時，他就希望重新與實際世界接觸。一八八三年中，他擬定了在萊比錫大學講學的計劃；但是，大學當局則認為這種講學計劃不可能實施，主要因為他有問題的作品內容之故。尼采繼續留在世界外，而當他設法使自己專心於工作時，就逐漸變得緊張起來了。

一八八九年一月，當他四十五歲時，由於一條腦神經的錯亂，引致了他的崩潰。一九〇〇年，死亡結束了他纏綿的疾病。

尼采的世界：尼采可以在其中行動和觀察，思考和表達思想的世界——首先，在他的青年時期——由日耳曼文化，以及人文學派，詩人和愛國主義的傳統，而傳達給了他。

尼采拾起了古典語言學的研究。這一研究不僅提供了他畢生以之的偉大古典觀念，而且，當他還是一名學生時，它也引導他與一位偉大的天才一次幸運的會晤。李歇爾的古典語言學研習會，在哲學方面的闡釋技術是獨一無二的；各行各業的非語言學者，甚至包括許多學醫的人在內，以學點「方法」的觀點，而參加了這一研習會。在李歇爾所提倡的技巧和態度上，有一些為每種科學所共有的基礎：即區別真 (real) 和非真 (unreal)，事實和虛構，可顯示的知識和意見，以及客觀的確信 (objective certainty) 和主觀的信服 (Subjective conviction) 之藝術。祇有集中注意力於一切科學所關切的共同點上，吾人才能清楚地獲得有關科學知識本質之理念。

尼采於此就體認到學術研究者之本質了：他的清廉，他不斷與自己思想的嚴格鬥爭，他的純樸和不矯飾的感情。

尼采明確表示的教學衝動，祇找到極爲罕見的真實性。他在教育學院，以最清醒却日漸不耐的心情，履行如一位大學教授的任務，和如一位教師的責任。在他擔任教授職務的整整十年中，當他履行嚴格的教授責任時，他過着緊張、艱困的生活狀態，儘量保持充沛的精力，致力於引起他入迷，却也挑逗着他，而仍未明確顯示的召喚。

一八六七年——六八年間，尼采投入諾姆堡的野戰炮兵隊服役。然而，當他躍上戰馬，遭到引起化膿結果的一次傷害、和連續數日輾轉床第的疾病時，他的服役就提前結束了。當一八七〇年戰爭期間，他志願充當一名看護兵。他對他擔任教職的中立國之忠誠，不允許他充當一名戰鬥員。他受到痢疾的折磨，甚至在戰爭結束前，就已回到他的教授崗位上去了。

事實上，尼采自二十五歲起，直到他的生命結束，就一直住在國外，即有整整二十年的時間，他從國外來看日耳曼民族，在他的世界觀上，產生了非常大的差別。他在國外的地理環境上，使得他的嚴格見解更趨敏銳，就如在邊界上生活的人們，所共有的情形一般。並且特別是到了後期，他因不斷旅行之結果，當他冒了飄泊不定的危險時，更認清了這一共同現象。環境改變，不斷地製造一再更新的感觉上刺激，能使得一個人生活在不斷擴張，以便擁抱任何可獲得真正實體

的地平線以內的事物。並且，由於對故鄉的憎恨感，因遙遠的距離而強化了時，更提高了一個人對故鄉的愛憎感受。

因尼采對世界、職業、朋友和教學活動的疏離感的結果，他必須從涵蓋極廣範圍的閱讀計劃中，去索取新的經驗；不過，在數量上，因他的眼睛之故，而必需加以限制。當我們知道，他於一八六九年和一八七九年間，從巴塞爾圖書館所借閱些什麼，並且知道他自已書房中的大部份圖書時，我們固然不能斷然說，他都讀過這些書，然而，它們都經他撫摸過，並且，在若干方面，都引起過他的注意，是可以斷言的。他擁有逐週寄給他的新書目錄（一八八〇年四月十一日，致歐弗貝克函），並且，他不斷計劃留在有大圖書館的城市中（一八八四年五月二日和八七年九月十七日，致歐弗貝克函），畢竟這不可能祇是曇花一現的現象。

特別醒目的，是大量討論自然科學，和民族學的書籍，活像他希望和研究語言學時，決心要疏忽實際知識似的。對這些書籍的略讀，也許就已經刺激他了。但是，就大體來說，這些書的內容，都低於他的水準。因此，僅可視為關於生物和物理科學方面，實際是第一手資料的一種替代品。

尼采能從相當有限的閱讀中，發現如此多，是十分令人驚奇的。他能立刻抓住要點。當他閱讀時，他能想像出書籍的作者，且本能地感覺出他們所思和所寫，相當於什麼，和他們所意指的

事實是什麼。他不僅清楚他們的主要素材，並且也清楚採用爲主題的這些主要素材的思想本質。

文字和思想，時常直接從閱讀的素材傳給尼采，那是就他對哲學的專心上，比他對表達方法之實際起源上，較少有意義的一個事實。從歌德作品中發現的「超人」一詞 (superman)，和從海姆 (Haym) 作品中發現的「文化俗人」 (Cultural philistine) 一詞，比起他從鮑格特 (Bouget) 作品中所取用的透視法和「頹廢」等表達，就比較不重要了。如尼采的這種感受性——自然發生的，直接運作的和全盤吸收的——對每一創造性作品都是不可缺少的。

尼采甚至還是一名孩子時，就已經有哲學研究的立場了。叔本華成了這位年輕人心目中的哲學家。而 F. A. 藍哲 (F. A. Lange)，史比爾 (Spir)，塔克穆勒 (Teichmüller)，杜林 (Dühring) 和范·哈特曼 (E. V. Hartman) 提供了他有關傳統的概念。至於一羣偉大的哲學家們，他祇精讀過柏拉圖。然而，這就是一位語言學者而言的。(在後期，當他知道了自己知道柏拉圖何等貧乏時，他非常「吃驚」。一八八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致歐弗貝克函)。他的哲學研究的實質，主要不是對這些著作之研究而獲致的；而是他對蘇格拉底以前的希臘世界的沉思而發展出來的：首先是蘇格拉底以前的哲學家，然後是西奧格尼斯 (Theognis)，接着是悲劇詩人們，最後是修西的底斯 (Thucydides)。成爲他對哲學興趣之一種結果的，是他對戴奧真尼斯·拉底烏斯 (Diogenes Laertius) 的研究，提供了他若干哲學史的知識。幾乎從未透澈

研究過偉大的哲學家，並且大部份的知識是依靠二手資料的尼采，仍然有能力獲得由傳統傳遞下來，且已枯竭了的思想外殼以外的主要泉源。在他自己本性的督促下，他逐年對真正的哲學問題之掌握，就更具決定性了。

就以他對哲學研究方法的一種結果而言，他受到許多詩人們（嚴格說來，也許可稱做哲學家）所吸引。當他在青年時期，他被賀德林（Holderlin），特別是恩貝多克利（Empedocles）；西元前五世紀之希臘哲學家和政治家）和亥伯龍神（Hyperion，希臘神話 Uranus 與 Gaea 之子，太陽神 Helios，月神 Selene，黎明神 Eos 之父，後被認為 Apollo 神）弄得心神盪漾；在後期時，被拜倫的孟弗瑞特（Manfred）所迷住。當晚年時期，他也籠罩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影響之下。

也許，他在音樂上的興趣，甚至更要根深蒂固和致命，再沒有一位哲學家對音樂會如此陶醉，或者發現音樂如此不可抗拒的。甚至還在童年時期，他已完全被音樂所迷住。在他的青年時期，他就已準備畢生致力於華格納（P. Wagner）的音樂。他對華格納是無條件醉心的，他在生命的後期時坦認：「一直到末了，我是一位除了調子外，找不到別的慰藉的老樂師。」（一八八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致蓋斯特函。）一八八八年中，他對音樂的依戀甚至更趨強烈：「音樂目前帶給我前所未有的真正經驗。它使我清醒，使我孤立於自我之外……而每當如此時，它賦予了我力量

。每一個有音樂的傍晚過後，緊接而來的，是充滿着斷然決然的洞悉力和觀念之翌日清晨。……沒有音樂的生命，簡直是一種錯誤，一種困境，一種放逐。」（一八八八年元月十五日，致蓋斯特函）。對他來說，「太陽底下，沒有比音樂的命運，更值得關懷的了。」（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一日，致蓋斯特函。）

然而，同一個尼采，以相同的激情，從音樂上掉頭他去。一八八六年中，他寫下有關一八七六年以後的歲月時，有如下的描述：「我開始澈底地否定自己一切羅曼蒂克的音樂——那種曖昧的、矯造的和猥褻的藝術，剝奪了精神力量和愉悅，誘使種種模糊的理念，和傲慢的色慾。『小心樂師——』（Care musician）是今天我對那些勇敢得、足以堅持精神物質中乾淨的人之忠告。」因此，他對音樂的判斷，是與歷代相傳的反音樂的哲學傳統是一致的：「音樂缺乏表達精神上狂喜的聲音：盡力表現浮士德、哈姆雷特和孟瑞弗特的心靈狀態；它略掉了精神和傳達情緒的狀態。」「詩人較音樂家站在更高的層次上，因為在訴諸全人類上，他作了較高的要求，而思想家則作了還要高一層的要求：他要求吾人集中的和整體的新生力，並且要我們放棄享樂，而與全力揚棄一切自我中心的衝動去戰鬥。」尼采的意見是：「錯誤，甚至致命發展瞭解，和缺乏抑制的恨和誹謗，也許部份是由於對音樂不知節制所帶來的。」音樂是「危險的」：「它的放蕩和它的趣味，激發了基督徒的處境……與缺乏清淨的心智，和暴亂的心靈夢境攜手並進。」至少，多少

有點偏愛的，是視音樂爲有些造作的音樂觀。這種造作，最後找到了思想上的最高表達：「音樂是我的前導……所以迄未曾說或想的仍然很多。」

當尼采在區別真摯的音樂與危險的、挑撥性的和混亂的羅曼蒂克音樂時，他好像從音樂這樣一種矛盾的門徑中，找到了一次逃避。對華格納的音樂而言，他冀望反對前者，他相信，前者他已在蓋斯特的作品中找到了。早在一八八一年時，他想像蓋斯特爲「他的第一程序的主人」。他的音樂與他自己的哲學有關聯（一八八一年五月十八日，致歐弗貝克函）；而這種音樂，意指「我們有新的實踐和重生之聲音中的辯證。」（一八八二年十月，致歐弗貝克函）。尼采遵循這一路線，最後要求音樂「必須像十月中一個下午般的寧靜和深邃；它是自足的、舒暢的和溫柔的；一位充滿卑微和嫵媚的甜美小婦人。」而在這一條路線上時，他也讚揚比才的卡門（Bizet's carmen）一曲，爲一了不起的模範；不過，這是不真心所意指的一些事情：「你務必不要把我對比才的說法，看得太認真；因爲我畢竟還是我，我何故不重視他，是有一大堆理由的。」但是，「就以對華格納的諷刺而言，他却有極大的影響力。」（一八八八年十二月廿七日，致福哈斯函）。

如果吾人了解，尼采受音樂的薰陶究竟有多透澈，如果吾人考慮到他閃爍的評斷——特別是那些非常錯誤，却對蓋斯特的曲子極力支持的評價——和考慮到他自己作曲時，他認識到音樂不可能是他自己的長處。（尼采以書面於一八七二年承認漢斯·范·彪勞（Hans von Bulow）